

Africa

穿梭 黑暗大陸

晚清文人對於非洲
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

顏健富 著



臺大出版中心

10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本著作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穿梭 黑暗大陸

晚清文人對於非洲
探險文本的譯介與想像



顏健富——著

目 錄

001	導論
001	一、前言
005	二、研究主題：非洲探勘／冒險記
009	三、非洲形象：「黑暗大陸」的演繹與變調
015	四、理論思考：文本行旅、異國形象與翻譯改寫
023	五、本書架構與論文出處
025	第一章 傳教、旅行與研究：立溫斯敦非洲傳記的翻譯與傳播
025	一、前言
029	二、譯本的發生：從留美學生計畫到世界地理學的傳播
039	三、非洲人體標籤：中國禮教與西方殖民話語的交疊
051	四、文人化的非洲視野：「研究」與「傳教旅行」的選擇
062	五、接受視野：晚清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的凸顯
071	六、結語

CONTENTS

075	第二章 從上海天主教會、文藝圈到域外遊記： 論《三洲遊記》對於施登萊 <i>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i> 的翻譯改寫
075	一、前言
077	二、譯本的發生：從《三洲遊記》到《斐洲遊記》
088	三、上海天主教會：教義改寫
097	四、滬地文藝圈：情誼展演
106	五、晚清地理學：域外想像
115	六、結語
117	第三章 拆除主幹，拼湊片段：論《斐洲遊記》對 於「中國人在路上」的形塑
117	一、前言
119	二、虛構人物：民族身分的重塑
125	三、拆除主幹：從尼羅河探勘到風土記載
136	四、拼湊片段：抒情、啟蒙與敘事
154	五、接受視野：譯本？實錄？
159	六、結語

目 錄

161	第四章 穿越非洲的心臟：論《飛行記》的地理路線、文明階梯論與科學冒險
161	一、前言
164	二、話說從頭：從凡爾納《氣球上的五星期》到中譯本《飛行記》
178	三、地理學路線：穿越非洲的心臟
189	四、文明階梯論：文明、半開化與野蠻
198	五、科學冒險：非洲飛行記
208	六、結語
211	第五章 編「野人」之史：論林紓翻譯哈葛德《蠻荒誌異》
211	一、前言
215	二、生命共振：英布戰爭、祖魯戰爭與甲午戰爭
224	三、編「野人」之史：從《鬼山狼俠傳》到《蠻荒誌異》
235	四、神怪小說：通俗文學的現代化
244	五、種族之感：從《黑心白心》到《蠻荒誌異》
253	六、結語

CONTENTS

255	第六章 演述非洲，言說中國：晚清作者筆下的異域形象與自我投射
255	一、前言
258	二、亡國滅種：瓜分非洲，掠奪中國
268	三、演繹黑種：烏鬼、黑奴、黑蠻
277	四、非洲風土：觸險蹈危，荒地蠻俗
287	五、東亞病夫？冒險非洲，拯救中國
297	六、結語
299	結論
301	一、文學史反思：非洲探險記的消長起落
304	二、翻譯觀重審：翻譯改寫的研究潛能
307	三、跨文化檢討：「非洲」形象的反射
308	四、譯著參照系：晚清「非洲」書寫
313	徵引書目
313	一、原始文獻
325	二、近人論著
331	三、學位論文

目 錄

332 — 四、外文論著

336 — 五、網頁資料

337 — 索引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導論

一、前言

十九世紀後半葉，各種新興媒體於上海誕生，如傳教士辦理的《六合叢談》（1857年創辦）、《教會新報》（1868年創辦，1874年改為《萬國公報》），英商創辦的《上海新報》（1861年創辦）、《申報》（1872年創辦）等刊物，大量刊登新聞、西學、傳教、貿易與論說，逐漸形塑一瞻望世界的窗口。來自不同地區的文人來到上海，投入由新聞、出版社與印刷結為一爐的媒體產業中。這批崛起於上海文化舞臺的文人／報人群體，如王韜（1828-1897）、錢昕伯（1832-？），《新報》的袁祖志（1827-1898）與《益聞錄》的鄒弢（1850-1931），處在華洋夾雜的城市裡，透過辦報、著書與創作等方式，推開世界的窗戶，推敲與想像各大洲的歷史、地理、文化、人種與風土。

隨著工業技術擴散、社會關係與新世界觀的衝擊，進入二十世紀的文人，如火如荼推動新世界觀。1902年由梁啟超（1873-1929）主編的《新小說》、1903年由李伯元（1867-1906）主編的《繡像小說》、1906年由吳趸人（1866-1910）主編的《月月小說》、1907年由黃摩西（1866-1913）與曾樸（1871-1935）主編的《小說林》，均透過刊物譯介與思潮推動的方式，投射「旁咨風俗，廣覽地球」的世界想像。¹無論是報刊文章、綜合性雜誌、新聞報導、海外記載、文化評介、傳教士話語或是各種文學書寫，無不展現出對新世界的描繪。凡此種種，

1 [清]魏源編，《海國圖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76，頁1889。

用梁啟超之語便是受到「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之勢力所簸盪、所衝擊、所驅遣，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使將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²

若就傳統文獻而言，中國早有「非洲」的記載，如宋代趙汝適（1170-1231）《諸蕃志》有「層拔國」、「木蘭皮國」、「邊根陀國」等記載；元代汪大淵（1311-1350）《島夷志略》則有「特番里」、「班達里」、「曼陀郎」、「加裏那」等記載，均可對應非洲國家的譯名。³明末艾儒略（1582-1649）《職方外紀》介紹「利未亞洲」：「天下第三大州曰利未亞，大小共百餘國。西南至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南極出地三十五度；極北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十八度。」⁴此將「非洲」置入具體經緯度的描述方式，比起中國傳統文獻，又進一步推進中國人對於「非洲」的認識。

在「面向世界」的思潮中，十九世紀的非洲介紹，從傳統文獻的格局普遍走向歷史地理學的視野。自1815年刊出《察世俗每月統記傳》以降，可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新釋地理備考》、《萬國地理全集》、《地理全志》、《格致彙編》、《萬國史記》、《列國變通興盛記》、《天下五洲各大國志要》與《地理初階》等刊物與著作相繼發行，擴展世界的歷史地理面貌，如經緯度、政治體制、歷史發展與文化風情等。林則徐（1785-1850）《四洲志》、魏源（1794-1857）《海國圖志》、徐繼畲（1795-1873）《瀛環志略》都收入「非洲志」，介紹非洲地理、歷史、政治、風土與民俗等。從命名而言，即可見到晚清出現各種不同於傳統文獻的音譯，如「非洲」、「菲洲」、「斐洲」、「阿非利亞」、「亞非利亞」、「阿弗利加」、「亞弗利加」、「阿佛利加」、「亞斐利加」、「阿斐里加」與「阿非利加」等。「阿非利加」乃是Africa之音譯，而「非洲」則是簡稱。概括而言，這些稱謂使用較多的是「非洲」、「菲洲」與「斐洲」等簡稱。

2 [清]梁啟超，〈夏威夷遊記〉，《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第2冊，頁1217。

3 傳統文獻與非洲國家對應譯名之相關研究可參閱李仲均，〈趙汝適與《諸蕃志》〉，《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頁39。沈福偉，〈元代航海家汪大淵周遊非洲的歷史意義〉，《西亞非洲》雙月刊1983年第1期，頁33-40。

4 [明]艾儒略著，謝方校譯，《職方外紀校譯》（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05。

當近現代報刊崛起後，各編務人員又將非洲的歷史地理學引薦給讀者，如高度關注地理學的刊物《益聞錄》，開闢「五洲雜俎」、「時事匯登」、「海外通訊」等專欄，不遺餘力地介紹「非洲」歷史地理學。處於十九世紀訊息全球化的浪潮中，晚清報刊不僅報導介紹歷史地理學，亦即時更新非洲動態，如五〇年代縮短繞行好望角路線的埃及火車鐵路、六〇年代衝擊中西交通路線的蘇伊士運河、七〇年代施登萊（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探入非洲尋找立溫斯敦（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3）的消息、八〇年代對於英布戰爭的報導、九〇年代各列強對於非洲的瓜分，以及貫穿各時段的「販奴」與「禁奴」等強調人道主義的新聞，在在展現時人對於非洲時事的關注。

由傳教士主導的刊物尤其關注非洲奴隸的新聞，如 1873 年《中西聞見錄》第 14 期〈埃及近事：阿斐里加西海販賣黑奴〉，1874 年第 19 期〈各國近事：阿斐里加近事：英國遣人前往阿斐里加〉、第 20 期〈阿斐里加近事：阿斐里加西海口〉等文，皆提出「傳教救奴」、「禁止販奴」與「教化非洲」等訴求。由此而觀，晚清的中國文化界捲入「全球化」新聞時事的視野，共享「非洲」的最新訊息，形塑公共輿論空間時，也拉近中國與國際的距離。

原本作為地理學報導對象的「非洲」，進入十九、二十世紀之交，逐漸變為是譯者訴說自我生命情境的櫥窗。隨著中國局勢的演變，「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的報導急遽增加，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中，晚清人士透過圖像、新聞、評論、詩文與學堂歌等，屢屢關注西方列強對於非洲領土的割據。顯而易見，敘說非洲，實是論者對於族群命運的反思。1902 年，中國之新民（梁啟超）刊登於《新民叢報》第 4 號的〈亞洲地理大勢論〉，清楚剖析西方列強競相發動殖民，「新世界之阿美利加，既無餘地矣」，於是關注「萬里不毛之沙漠，橫亘其中央，炎熱瘴癘，而利用極難」的非洲，講述「瓜分非洲之勢，如飶如潮，不轉瞬間，鬻割以盡」⁵的擔憂。

5 [清]中國之新民（梁啟超），〈亞洲地理大勢論〉，《新民叢報》，第 4 號（1902 年 3 月），頁 6，總第 50 頁。

隨著十九世紀的歷史地理學與新聞報導的推動，「非洲」逐漸成為一普遍知識，必然牽動文藝評論的模式。各評論者與創作者皆開啟「非洲」視野，將之納入評論圈，在世界的版圖上「發現」非洲。1897年，〈《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長篇闊論，演繹物種競逐與英雄崛起的背景，說明小說文體描寫「公性情」（英雄）的功能。作者演述各大洲發展時，涵蓋「非洲」，如「凡為人類，無論亞洲、歐洲、美洲、非洲之地，石刀、銅刀、鐵刀之期，支那、蒙古、西米底、丟度尼之種，求其本原之地，莫不有一公性情焉」。只是，在彼時的文明話語中，非洲「黑種」遭到貶低：「黑人低種之氓，其漸滅夷遲，降為臣僕，不復齒人之數，亦數千年於此矣」。⁶如此的「黑人低種」論，實是近現代人種論中屢見不鮮的論述模式。

晚清文藝刊物對於「非洲」有更多的轉化，如將「非洲」納入新的地理版圖，展現遼闊的世界觀。1908年，《小說林》第9期為配合「新年專號」刊出籌備已久的文章——雙管室主人的〈環球攬勝圖說略〉，以「學生、探險、工師、商人、教士、公使六人譜成環球攬勝圖」，透過六人輪流投骰子的方式決定停留定點。這份「環球攬勝圖」納入遙遠而陌生的非洲，如「南洋初渡（好望角）」、「女王信教（安達那那利佛）」、「五穀繁殖（尼羅河）」、「獅首女身（大石像）」、「女王遺念（金字塔）」、「商隊南行（聖城）」、「塵沙漫漫（撒哈拉大沙漠）」、「奇觀（庚哥阿瀑布）英教士李溫士敦始探得」、「通商要道（綏士河）」、「非洲北障（地中海）」、「非摩接壤（支伯拉德）」等。⁷此一翻新傳統「六逸圖」的「環球攬勝圖」，從非洲南部延伸到北部、從沿海地擴展到沙漠內陸，展現更具體與細緻的非洲版圖，頗能反映晚清的新空間想像。

除文藝評論外，晚清作者群透過文學創作，勾勒非洲的奴隸販賣、瓜分命運、風土民俗、黑人形象與致命獅子等，渲染一幅幅傲詭瑰奇的非洲場景。旅生

6 [清]嚴復、夏曾佑：〈《國聞報》附印說部緣起〉，原載於《國聞報》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八日，收入阿英編，《晚清文學叢鈔·小說戲曲研究卷》（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2、4。

7 [清]雙管室主人，〈環球攬勝圖說略〉，《小說林》，第9期（1908年2月），頁1-13。

《癡人說夢記》、許指嚴（1895-1923）《電世界》、吳趸人《新石頭記》、荒江釣叟《月球殖民地小說》與碧荷館主人《新紀元》等，程度不一地觸及非洲場景，雖然著墨不多，卻彌足珍貴，反映晚清作者已開始將「非洲」轉化為敘事背景的嘗試。在這些作品中，何迴《獅子血》是著墨最多的一篇，自第六回「為游湖忽入奴隸場」到第十回「以武定國以文化民」，探及非洲民族、文化、體制、風俗，勾勒非洲沙漠、部落與奴隸市場，占全書一半篇幅。就介於歷史與小說之間的演義作品而言，沈惟賢（1866-1940）與高尚縉著作的《萬國演義》，勾勒黑人從非洲遭販賣到西方國家的悲慘命運，藉此控訴殖民掠奪與奴隸販賣等行徑。

二、研究主題：非洲探勘／冒險記

從上述的歷史地理學、傳教士話語、傳記書寫與文學創作等，反映晚清人士透過「世界」的櫥窗，眺望非洲。在各種涉及非洲的資料中，隱藏了一尚未受到中文學界觀察的主題：非洲探勘／冒險記。此一主題在跨文化行旅的路線中，由西方傳播到晚清文化界，饒具學術探討的意義。

十九世紀有關「探勘／冒險」非洲主題的出現，絕非意外。隨著英國工業革命與法國政治革命的進展，歐洲社會經濟高速發展，掀起「瓜分非洲」的殖民競逐，如同上文提及梁啟超指出「新世界之阿美利加，既無餘地矣」的情況下，「瓜分非洲之勢，如燄如潮」。成立於 1830 年的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創始名稱是「倫敦地理學會」，扛著「地理科學的進步」的名號，以探索非洲、中亞與印度等英國殖民地為主旨。該會先後贊助立溫斯敦·施登萊、斯科特（Robert Falcon Scott, 1868-1912）、沙克爾頓（Sir Ernest Henry Shackleton, 1874-1922）、亨特（Hunt）與希拉蕊（Hillary）等人，前往各地探勘。⁸

經由政府機關的支持、地理協會的贊助，探險者前仆後繼，闖入非洲，歷險

8 相關訊息可見皇家地理學會的官網：<https://www.rgs.org/about/the-society/history-and-future/>（檢索日期：2020 年 12 月 20 日）

歸來後，又受到皇家地理學會頒獎、演講邀約與傳記出版等，激勵有志之士探勘非洲。1947年，《東方雜誌》第43卷第6號刊出〈非洲的發現探險史實〉，歸納諸種發現非洲與探險非洲的事蹟，可見到這些人士探勘非洲的意義。相比之下，早期各冒險者對於非洲的探勘，多止於非洲沿海一帶，如「一四八八年，葡萄牙航海家地亞士（Bartholomew Dias）通過好望角」。可是進入十九世紀，隨著立溫斯敦與施登萊等地理學家攜帶測量儀器與科學工具等，探入非洲，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一八二二年，鄧海姆（Denham）及克拉柏當（Clapperton）及英國探險學家『越過』撒哈拉沙漠；一八五一年，英國李文斯頓（Livingstone）發現三比西河 Zambesi River；一八五六年，德國探險家拜斯（Barth）『探險』蘇丹 Sudan；一八七七年，英國探險家斯坦雷（Stanley）『探險』剛果河。」⁹從拜斯（巴爾特）對於非洲北部與中部的探索，到李文斯頓（立溫斯敦）與斯坦雷（施登萊）對於非洲南部的探索，縱橫交錯地揭開過去神祕莫測的非洲內陸。

於此脈絡，各種有關非洲探勘的傳記相繼出現，如十九世紀五〇年代到非洲傳教的立溫斯敦《南非傳教旅行與研究》（*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1857）與從非洲北部探入蘇丹的德國探險家巴爾特（Heinrich Barth, 1821-1865）《中北非遊記和發現》（*Travels and Discoveries in North and Central Africa*）；七〇年代潛入非洲內陸探勘尼羅河源頭的施登萊的《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都是箇中代表作，大幅度揭開非洲內陸，記載非洲風土民俗。

伴隨著自強運動、洋務運動等，中國知識分子積極翻譯西書，從軍事技術、自然科學，逐漸擴展到社會科學與文學作品等，¹⁰不同於此前各種以宗教教義為

9 [美] Roy Chapman Andrews 著，陳澤泳譯，〈展開新世紀的探險·非洲的發現探險史實〉，《東方雜誌》第43卷第6號（1947年6月），頁79。

10 熊月之，〈晚清社會對西學的認知程度〉，收入王宏志編，《翻譯與創作：中國近代翻譯小說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34-35。據熊月之統計，從1843年上海等東南通商口岸開埠開始，西學即在中國蓬勃傳播，1843年至1860年出版西書有一百零五種，1861年至1900年出版西書有五百五十五種，涵蓋哲學、社會、科學（內含哲學、歷史、法學、教育等）、自然科學（含算學、重學、電學、

主的譯本如《意拾喻言》（《伊索寓言》）與《天路歷程》等，《申報》於1872年5月開始連載西方的文學著作如《談瀛小錄》（《格列佛遊記》第一卷〈小人國遊記〉之譯本），接而刊出歐文（Washington Irving, 1783-1859）《一睡七十年》、馬里亞特小說的編譯《乃蘇國把沙官奇聞》。同年，11月11日，中國第一份文藝刊物《瀛寰瑣記》出版，第三卷開始連載英國翻譯小說《昕夕閒談》（*Night and Morning*）。就文學翻譯的起始階段而言，中國報刊連續刊登與出版兩部非洲探勘記。1879年《申報》出版單行本《黑蠻風土記》，乃是翻譯立溫斯敦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記錄傳主的實地考察，如穿越喀拉哈里沙漠抵達蓋米湖，又發現尚比西河與位於尚比亞邊界的維多利亞瀑布；1883年，《益聞錄》連載《三洲遊記》，乃是翻譯施登萊 *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記錄傳主探入非洲尋找尼羅河源頭，解決西方地理學界爭議多時的疑案。這兩部以「探勘非洲」為主的譯著，接而又輾轉由各出版社結集、叢書輯錄或報刊連載，恰能反映晚清文化界對於立溫斯敦與施登萊探勘非洲活動的關注，同時促進晚清人士對於「探勘非洲」的認識。¹¹

在一連串的「發現非洲」的探勘視角下，文學創作者透過虛實交錯的敘事想像，將「非洲」化為小說敘事的空間背景，拓展「冒險非洲」的文學主題。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初，法律系畢業的凡爾納（Jules Gabriel Verne, 1828-1905），懷著文藝作家夢，運用各種地理學知識，寫下以非洲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氣球上的五星期》。凡爾納將「非洲地理學」推到小說場景前沿，安排人物搭乘氣球，串連上述巴爾特對於非洲北、中部的探索以及立溫斯敦等人對於非洲南部

化學、光學、動植物學等)、應用科學(含工藝、礦務、船政等)與其他(包括遊記、雜著、議論等)。

11 如王韜〈探地記〉指出施登萊與立溫斯敦相遇，「把臂歡然，恨相見晚」；郭嵩燾提及施登萊1874年到非洲探險，「起自阿非利加之東曰桑希巴爾，經西出鋼戈江」。分別見：〔清〕王韜，〈探地記〉，收入〔清〕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臺北：廣文書局，1962），第12帙，頁11b，總頁9954；〔清〕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收入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第一輯）》（長沙：岳麓書社，1985），第4冊，頁339。

的探索路線。凡爾納不僅僅回應現實中的地理探勘者的路線，甚至透過小說敘事的方式，讓人物穿越現實中仍無人可以穿越的「非洲心臟」。此一結合「科學」、「冒險」與「殖民」的「冒險非洲」的主題，受到彼時正實施改革自強運動的日本與中國文化界的高度關注。明治十六年（1883），井上勤（いのうえ つとむ，1850-1928）先是依據英譯本翻譯為《亜非利加内地三十五日間空中旅行》，由繪入自由出版社所出版。1903年，《江蘇》雜誌第1、2期刊載沒有譯者署名的〈空中旅行記〉、1907年《小說林》社出版謝忻翻譯的《飛行記》，共三十五回。此一科學冒險小說結合科學想像與歷史地理學，對於晚清文學界正在推動的「科學小說」，¹²無疑有推波助瀾的效用。

不同於凡爾納的科學冒險書寫，1875至1882年期間曾於非洲工作的哈葛德（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在個人的非洲經歷上，寫出一系列結合冒險、浪漫與傳奇的非洲羅曼史（romance）。他結合非洲國族、男女情愛，以白人探險者的角色，探入神祕的非洲世界，經歷生死交關的奇險挑戰。「非洲」在其筆下成為神祕蒙昧的國度，布滿咒語、木乃伊與橫闊時空的未解之謎。相比起哈葛德一系列英雄主義的書寫，更值得關注的是他以黑人視角為主的《鬼山狼俠傳》（*Nada the Lily*）與《蠻荒誌異》（*Black Heart and White Heart*），演繹祖魯族群力挽狂瀾、保家衛國的敘事，替已然灰飛煙滅的祖魯政權，留下赫赫紀錄。

在瓜分非洲／瓜分中國的時代共感中，林紓（1852-1924）透過哈葛德著作的翻譯，孜孜矻矻地叩問族群的命運，植入自身的訴求、風俗習慣、文化趣味、道德規範與政治情境等，使得「非洲」成為譯者訴說自我生命情境的櫥窗。林紓透過一系列附於譯著的序跋，指出自身翻譯哈葛德小說之緣由。《霧中人·序》尤其語重心長：「余老矣，無智無勇，而又無學，不能肆力復我國仇，日苞其愛

12 如1900年，陳繹如與薛紹徽翻譯《八十日環遊記》；1902年，盧籍東翻譯《海底旅行》；1903年，魯迅翻譯凡爾納《月界旅行》、梁啟超翻譯《十五小豪傑》，海天獨嘯子翻譯押川春浪《空中飛艇》、楊德森翻譯愛斯克洛提斯《夢遊二十一世紀》；1904年，包天笑翻譯《秘密使者》；1905年，吳趸人翻譯菊池幽芳《電術奇談》；1906年，周桂笙翻譯凡爾納《地心旅行》等。

國之淚，告之學生。又不已，則肆其日力，以譯小說，其於白人之蠶食斐洲，累累見之譯筆，非好語野蠻也，須知白人可以併吞斐洲，即可以併吞中亞」¹³ 他憂慮中國會步上非洲慘遭蠶食併吞的後塵，因而以「累累見之譯筆，非好語野蠻也」的自辯模式，回應孟子「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的儒家關懷。

本書在跨文化行旅的架構下，觀察各種探勘／冒險非洲的文本，翻譯傳播到晚清文化界的過程。此一主題蘊含著「發現新大陸」、「科學文明」、「冒險精神」與「殖民擴展」等主題，已然脫離文學傳統的神魔範式，展現各種航海、飛行記述，又可鼓舞國民精神，乃是一值得學界關注的議題。

三、非洲形象：「黑暗大陸」的演繹與變調

本書透過系統性研究，試圖提出一個過去較受忽略的現象。晚清人士反映多元的世界觀，從「探勘非洲」的著作到「冒險非洲」的著作，從傳記文學到文學想像，都有所發展。晚清譯者面向各種探勘／探險非洲的文本時，導入自身的需求與訴求。從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黑蠻風土記》與《斐洲遊記》，到二十世紀初的《飛行記》與《蠻荒誌異》等，都可見到譯者透過翻譯改寫的模式，回應中國的政治局勢與文化情境。譯者對於非洲譯著的翻譯與改寫，亦潛藏了屬於目標語社會脈絡的論域，替原著注入晚清文化脈絡的訴求。

「異國形象」不只是對異國現實單純複製式的描繪，更經由作者的凝視，套入特定的觀看模式。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從西方歷史、文學與思想等材料，指出西人因其時代所需而於各階段對「中國」投射或正或負的形象；¹⁴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指出二十世紀初中國發生反帝國

13 [清]林紓，〈《霧中人》序〉，收入[英]哈葛德著，[清]林紓、曾宗鞏譯，《霧中人》（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頁1-2。

14 史景遷指出：「初來中國者」將「中國」當為強大的民族，如十九世紀，西班牙人門多薩（Mendoza）應羅馬教皇寫的《大中華帝國史》上溯到唐堯時代、品托（Pinto）《遊歷者》又進一步美化中國。歐洲對於中國的美化，乃為批判與解決自

主義的義和團運動，使得美國人大力抹黑中國。¹⁵在「異國」形象的理論思考下，不同的描述者會因特定的意識型態對於異國投射不同的形象。循此視角，可以觀察與思考的是：近現代西方傳教士、戰地記者與各小說作者對於「非洲」投射的形象為何？一旦，中國譯者翻譯相關著作時，又會產生怎樣的接受與變化呢？

在西方的殖民話語下，傳教士、戰地記者與各小說作者紛紛對於「非洲」投射「黑暗大陸」(dark continent)的形象。¹⁶「黑暗大陸」不只是荒蕪、原始、未經開發的自然空間描述或中性的風土民俗記載，更反映人類在文化形塑和歷史建構過程中的關係。殖民者帶著不辯自明的正義光環，如人道主義、宗教福音、消除奴役與貿易往來等理由，長驅直入非洲內陸，開啟文明化的工程，大肆勾勒描摹危險的世界。「黑暗大陸」的形象，實是投射描寫者的意識形態，從慘絕人寰的奴隸制度、人口販賣到飲血茹毛的風俗禮教，將非洲黑暗化，從而印證殖民發展的必要性。

以蘇格蘭傳教士和非洲探險家立溫斯敦為例，《南非傳教旅行與研究》一書，多處透過「黑暗」化的非洲場景，投射因缺乏福音啟迪而魅影幢幢的幽暗大陸，如「在深邃黑暗的森林處」(In the deep, dark forests)或是「在更黑暗的幽深處」(in the darker recesses)，隨處可見代表人頭與獅子的偶像崇拜物、沾滿藥物

身社會的問題與民族危機。隨著西方的強大，原為應付危機的視角轉向批判與否定，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從「法」精神否定中國，黑格爾(Hegel Georg)將中國排斥到歷史外。見史景遷，《文化類同與文化利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12-34、57-85。

- 15 費正清指出：「1900年的中國，在美國人印象中是骯髒、野蠻的，同尚未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文明相比，相差甚遠。」費正清著，傅光明譯，《觀察中國·導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頁9。
- 16 關於非洲是「黑暗大陸」的形象，可參見以下數篇論文：Patrick Brantlinger, "Victorians and Africans: The Genealogy of the 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 *Critical Inquiry* Vol. 12. No. 1 (1985): 166-203. Rebecca Stott, "The Dark Continent: Africa as Female Body in Haggard's Adventure Fiction." *Feminist Review* 32.1 (1989), 69-89. Lucy Jarosz, "Constructing the Dark Continent: Metaphor as Ge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Vol.74, No. 2 (1992), 105-115.

的棍棒與刻在樹皮上的人臉輪廓等，¹⁷ 無不彰顯傳教者透過福音照亮黑暗非洲的必要性：「如果這些人必須像某些種族的動物一樣在文明的發展中滅亡，那是可惜的。上帝准許這一次到來，他們可能會得到福音。這是死亡靈魂的慰藉！」¹⁸

相比起立溫斯敦以「黑暗大陸」所訴諸的宗教福音，施登萊更是全方位以「黑暗」描寫非洲內陸，投射一因未經文明洗禮的荒蠻狀態。施登萊因《我如何尋找立溫斯敦》（*How I found Livingstone*）而聲名大噪，接而獲得各種探勘非洲的機會。施登萊替其第二、三部非洲傳記取名為《穿越黑暗大陸》（*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與《在最黑暗的非洲》（*In the Darkest Africa*），以 Dark Continent 與 Darkest Africa 等「黑暗」意象，將「非洲」推入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此黑暗與光明、非洲與西方等二元架構，不免帶有西方的本位主義，如露西·雅羅斯（Lucy Jarosz）認為非洲屢屢被視為「原始、獸性、爬行動物或女性實體。它們被西方歐洲男性以西方科學、基督教、文明、商業與殖民主義等馴服、啟蒙、指導、開啟與穿越。非洲的這些特徵與那些被塑造為野蠻、原始和野蠻的其他邊疆與荒野類似。」¹⁹

文學作者更進一步透過敘事元素，深化與鞏固非洲作為「黑暗大陸」的形象，成為文學隱喻，尤以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黑暗之心》

17 David Livingstone, *Missionary Travels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 (New York: Harper, 1858), 328. 原文如下：“In the deep, dark forests near each village, as already mentioned, you see idols intended to represent the human head or a lion, or a crooked stick smeared with medicine, or simply a small pot of medicine in a little shed, or miniature huts with little mounds of earth in them. But in the darker recesses we meet with human faces cut in the bark of trees, the outlines of which, with the beards, closely resemble those seen on Egyptian monuments. Frequent cuts are made on the trees along all the paths, and offerings of small pieces of manioc roots or ears of maize are placed on branches.”

18 Ibid., 555. 原文如下：“If such men must perish by the advance of civilization, as certain races of animals do before others, it is a pity. God grant that ere this time comes they may receive that Gospel which is a solace for the soul in death!”

19 Lucy Jarosz, “Constructing the Dark Continent: Metaphor as Geographic Representation of Africa”, 108.

(*Heart of Darkness*) 最具代表性。康拉德將各地理探勘者的「黑暗大陸」形象提高到「黑暗之心」的層次，拓展文學想像的深度。《黑暗之心》描寫馬羅 (Marlow) 探入非洲剛果河的過程，從開場到結束，都可見到「黑暗大陸」的投射，一直到結尾之處：「一堆黑色的烏雲掛在海面上。在灰濛濛的天空下，那通向世界盡頭的寧靜河道陰鬱地流淌，似乎流向黑暗的最深處。」²⁰ 康拉德將「黑暗」意象投射非洲叢林、人性內在與社會道德面，層層交疊，逐步揭開位於非洲的白人的陰暗面。

在殖民話語、地理學探勘與冒險精神的追尋中，立溫斯敦、哈葛德與康拉德等作者的筆調下，對於「非洲」投射特定印象，逐漸形塑「黑暗大陸」的整體形象，反映各書寫者／形塑者的意識形態與美學成規。描述者按照自身的需要，修剪與編輯「非洲」的形象，刪除或遮蔽箇中可能構成矛盾的信息。當代學者布蘭林格 (Patrick Brantlinger, 1941-) 犀利指出：當西方探險家，傳教士與科學家「用光淹沒」時，非洲才變黑，需透過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火炬照亮。²¹ 當西人探勘者與文學書寫者創造出「黑暗大陸的神話」(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非洲」被視為一黑暗的大陸，需要經由各種探索、傳教、教育，才能去除黑暗，迎來曙光。

此一由西方論者塑造的「黑暗大陸」的神話，影響甚大，甚至傳播到中國。周桂笙 (周樹奎，1873-1936) 評論哈葛德小說時指出「非洲大陸，本極黑暗」。²² 謝忻翻譯凡爾納的《飛行記》時提及：「彼黑闇之世界，若何進行乎，

20 Joseph 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1999), 158. 原文如下：
“The offing was barred by a black bank of clouds, and the tranquil waterway leading to the uttermost ends of the earth flowed sombre under an overcast sky — seemed to lead into the heart of an immense darkness.”

21 Patrick Brantlinger, “Victorians and Africans: The Genealogy of the Myth of the Dark Continent.” *Critical Inquiry*, Vol.12, No.1 (Autumn, 1985), 166.

22 [清]周樹奎，〈神女再世奇緣著者解佳傳畧〉，《新小說》，第2卷第11期（1905年11月），頁3。

惟以如何之方法，方得橫過重雲，殊躊躇耳」；²³ 林紓翻譯哈葛德的著作《蠻荒誌異》提及：「彼蓋見黑闇之境，非人所處，而此巫處之，至為駭怪。凡蘇嚕澈俗，往往令人不歡」。²⁴ 從中國論者的評論到譯者的翻譯，紛紛凸顯非洲的「黑暗」、「黑闇之世界」、「黑闇之境」等形象。此一「黑暗大陸」，實是各方透過「在場成分」的介入，投射特定形象，潛藏了各方競逐的意識形態與價值思考。

若就中國譯者而言，除接受與傳播「黑暗大陸」的形象外，又因其不同於西方作者的意識形態、價值思考、思潮演進與社會發展等，而又衍生與蔓延更多形象的傳承與變調，甚至各種譯本演繹屬於中國譯者的聲音，在「黑暗大陸」上注入自身的聲音，如文人的抒情聲調、啟蒙意圖與敘事欲望等。在各種探勘／冒險非洲文本的翻譯中，譯者嵌入自身的世界觀、論域、旨趣與美學成規等，反映晚清文化界的規範、美學與視野，乃是譯者對於一急遽變化的時代的回應。在翻譯的過程中，不斷地拼湊、錯置各種晚清譯者關懷的片段，進行創造性的翻譯，動用其隨手可得的資源，即興發揮，導入自身的各種奇思幻想、意識形態與詩學美學等，遂使得晚清譯著所出現的「黑暗大陸」，又出現多種變調。

（一）中西文化思潮的疊加

當晚清譯者翻譯西方人士撰寫的非洲著作時，未必亦步亦趨於原著版本，反而是透過「翻譯想像」的模式，折射屬於自身脈絡的文化思潮、意識形態與美學成規等。當他們面向探勘／冒險非洲的文本時，嵌入彼時交鋒與交融的殖民論述與禮教傳統，產生複雜的組合效應。就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人種論述甚囂塵上的時刻，晚清人士翻譯非洲文本時，層層調動中西脈絡的華夏中心、禮教觀念、顛相學、人種論、黑暗大陸與文明進化論等思潮，猶如經緯般，穿梭其中，形成另一種變調的「黑暗大陸」。此翻譯想像，除了隱藏「天下中心」與「邊陲蠻

23 [法] 蕭爾斯勃內著，[清] 謝斫譯，《飛行記（上）》（上海：小說林社，1907），第9節，頁44。

24 [英] 哈葛德著，[清] 林紓、曾宗暉譯，《蠻荒誌異（上）》（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頁20。

荒」的對比架構外，又內蘊新舊世界觀的對比，反映時人觀看非洲的視角與殖民話語所形構的位階差序。

（二）文學化的非洲場景

根據翻譯研究，「詩學」(poetology) 乃是重要的視角，受到早於源語文化即存在的文學觀念、文學範式、創作手法與審美慣性等影響。在翻譯改寫中，譯者透過文字、意象、典故與文學傳統等，替譯本注入中國詩學，牽動譯本的轉向，致使原本的「黑暗大陸」變為是詩學化的非洲場景。這些來自不同世代與圈子的文人，如滬地、福建文藝圈的沈定年、鄒弢與林紓等，面向非洲探勘／冒險記時，紛紛注入中國詩學，將非洲原著置入自身的生命故事與詩學美感，浮現文人情誼與創作才情。探勘／冒險非洲文本，在中譯者的翻譯想像下，變為是文人逞才肆情的場景。無論是沈定年、鄒弢、林紓或謝斡等人的文人身分，都程度不一地調動譯本的轉向，遂使得「黑暗大陸」變為是譯者的詩學展演。

（三）譯者位置與關懷旨趣

當晚清論者翻譯以非洲為背景的傳記與小說時，因為不同於原著的視域，必然出現程度不一的轉調。譯者抽換原著具體的地理學的對話群體，接駁／錯置／衍生屬於晚清人士脈絡的論域，開啟不同於原著的域外想像。譯者引入晚清文化界訴諸的更廣泛的「世界」視野，如器物文明、餐桌禮儀、地理景觀、與五大洲介紹等。在瓜分非洲／中國的時代際遇中，林紓透過哈葛德小說，開拓一條通往中國文化政治語境的管道，強化更能符合晚清文化語境的保家衛國的戰士形象，發出各種具有鼓舞與警惕意味的序跋。謝斡翻譯凡爾納小說時，投射人物的冒險精神與科學文明的期許。凡此種種，都可見到中國譯者如何循著自身的旨趣，翻譯各種以非洲為背景的著作。

就上述各種「黑暗大陸」的翻譯變調而言，可見到晚清作者筆下的「非洲」形象，潛藏著豐富的議題，不只是對異國現實的複製，同時也反映注視者的文化處境與意識形態。從「異國形象學」而言，透過異國（客體，the object）反過

來觀察建構主體 (the subject) 以及其背後的文化整體的投射。晚清人士呈現的「非洲」形象，與其說是言說「非洲」，倒不如說是自我的文化象徵性表現。出現於不同文體形式的「非洲」形象，固然摻雜著紀實與想像、現實與幻想等成分，卻殊途同歸，折射時代的集體想像。言說他者，乃是敘說自我，從中國人士的瓜分焦慮到自身的禮教傳統與政治期許，反映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譯者與作者的訴求。

相比起「黑暗大陸神話」的意識形態剖析，本書藉著「黑暗大陸」的書名，更欲指向中文學界對於「非洲」仍處於「黑暗」的研究狀態。對於晚清文學研究而言，「非洲」地區如一陌生的天地，要如何穿梭這一片「黑暗大陸」呢？就現有研究，研究近代中非關係的論者甚少觸及文學材料，多集中於歷史與社會學等，如艾周昌《中非關係史文選（1500-1918）》、李安山編《非洲華僑華人社會史資料選輯》涉及近代中非關係的檔案、報導、回憶、訪談、書信與公函等。就文學研究而言，論者鮮少觸及「非洲」主題。

以本書追蹤的立溫斯敦與施登萊的「非洲探勘記」為例，乃是目前中文學界罕見的研究議題，即或是出現零星探討，但仍多有局限（詳見內文），普遍未能掌控譯本的發生模式，更無法進入文本內部，對照譯著與原著的異同。即或是一般較為熟悉的凡爾納與哈葛德小說，可是尚未關注凡爾納以非洲為背景的《飛行記》與哈葛德以祖魯戰爭為中心的《蠻荒誌異》。筆者以戰戰兢兢的心態，試圖促進學科領域的對話。透過多年的資料蒐集與文獻閱讀，開啟新的研究視野與論述議題。由於此一研究領域缺乏參照性的研究成果，猶如「穿梭黑暗大陸」，潛藏著各種挑戰與困難，行文過程，也必然出現盲點與不足，有待各方指教。

四、理論思考：文本行旅、異國形象與翻譯改寫

本書在翻譯理論的思考下，試圖將「非洲探勘／冒險記」，置入「跨文化行

旅」的架構，觀察相關文本的接受與衍變。「行旅」並非指向普遍定義的休閒旅行，而是強調文本從此點到彼點的空間傳播。於此行旅路線，譯本從原著的既定認知框架，發展到另一有著不同價值認知的文化脈絡時，必然與他方文化語境碰撞、排斥、分歧與交流等，造成語言文字、概念表述與情節片段的變調。

（一）跨文化行旅與異國形象

湯普森（John Thompson, 1951-）早已指出「全球化」可追溯至十九世紀中期，通訊網絡與訊息交流的規模開始越來越全球化。²⁵ 新式印刷技術確實促進彼時出版市場的發展與跨國交流。在工業技術的帶動下，各地出版品得以在全球化的國際市場中流通與傳播，出現各種跨國流動的路線。文本的傳播路線並非只是從西方到中國的一種模式，中間可能經歷其他地區，折射更複雜的「跨文化行旅」，如本書第四章討論法國凡爾納《氣球上的五星期》從法文原著發展到Chapman 英譯本 *Five Weeks in a Balloon*、井上勤日譯本《亞非利加內地三十五日間空中旅行》，再到中譯本〈空中旅行記〉（1903）與《飛行記》（1907）。從源語到目的語的過程中，相關著作經歷不同的文化脈絡，蘊藏各種饒具趣味的變調。

文本的「跨文化／語際」路線，必然在不同的文化與語系脈絡下，展現新姿。若以劉禾提出「跨語際實踐」觀察，可見文本的移動與流變，經歷「詞語、意義、話語以及表述的模式」的轉變，以及文本在主方語言與客方語言的接觸／衝突下，在主方語言中興起、流通並獲得合法性的過程。翻譯不只是與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衝突著的利益無關的中立的事件。實際上，它恰恰成為這種鬥爭的場所，在那裡，客方語言被迫遭遇主方語言，而且二者之間無法化約的差異將一決雌雄，權威被需求或是遭到挑戰，歧義得以解決或是被創造出來，直到新的詞語和意義在主方語言內部浮出地表。²⁶ 循此觀點，當文本輾轉傳播於不同的文

25 John B.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Cambridge: Polity, 1995), 4.

26 參見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頁 36-37。

化脈絡，與其他力量碰撞，開拓多重的向度。這些開拓，不僅僅表現於觀念與詞彙移植所產生的變調，更進一步延伸到文類形式、文學技法、觀念視野與價值內涵的轉變，開啟紛然雜陳的視野、價值與文化的對話。

在跨文化行旅中，譯本從客方語言走向主方語言的脈絡時，尚內蘊著「自我」與「他者」的對應關係。德國學者狄澤林克（Hugo Dyserink，1927-2020）提及「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追求目標：「首要追求是，認識不同形象的各種表現形式以及它們的生成和影響。另外，它還要為揭示這些文學形象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觸時所起的作用做出貢獻。」從其視角，可見形象學的研究重點並不是探討「形象」的正確與否，而是研究「形象」的生成、發展和影響；或者說，重點在於研究文學或者非文學層面的「他形象」和「自我形象」的發展過程及其緣由。²⁷「比較文學形象學」主要研究文學作品、文學史及文學評論中有關民族亦即國家的「他形象」（heteroimage）和「自我形象」（autoimage）。形象學的出發點是每個「自我群體」（we-group）不僅知道自我認同的話語，亦了解認知「他者」（the other）的話語，並以自我區別於他者。他者與自我「群體標記」是一種兩極結構或曰正反結構，在形象的形成過程中，自我形象與他形象相互照應和相互作用。²⁸

「異國」形象成為對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牽涉到作者所處的社會整體對異國的「總體認識」，反射「自我」的文化需要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空間。在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視野下拓展的「異國形象學」，乃是以「跨」（學科、語言、文化）為特色，倡導者如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1939-）與馬克·莫哈（Jean Marc Moura，1956-）等法國學者提出建立起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與視野等。由巴柔所提出，對學界影響重大的〈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形象〉等文章，便指出「形象學」不只是對異國現實的單純複製式的描述：

27 [德] 狄澤林克著，方維規譯，〈比較文學形象學〉，《中國比較文學》2007年第3期，頁160。

28 同前註，頁153。

形象是描述，是對一個作家、一個集體思想中的在場成分的描述。這些在場成分置換了一個缺席的原型（異國），替代了它，也置換了一種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對這種混合物，必須了解其在感情和意識形態層面上的反映，了解其內在邏輯，也就是說想像所產生的偏離。比較文學意義上的形象，並非現實的複製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視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組、重寫的，這些模式和程式均先存於形象。²⁹

巴柔指出面對「異國」形象時，得關注描繪者或是某一集體思想的「在場成分」，亦即這些描述者如何描述？描述者如何按照固有的文化模式、程序，導致重組與重寫？

形象研究無法脫離社會歷史時空而存在，馬克·莫哈在〈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一文中，關注「描述者」所勾勒的「形象」背後隱藏的「社會集體想像物」，強調形象模式有其意識形態的支撐，任何身分和形象都是在特定的社會和歷史空間中逐漸形成與傳播。馬克·莫哈論及「形象」源自一個寬泛且複雜的總體：「社會整體想像物」（*imaginaire social*）是「全社會對一個集體、一個社會文化整體所做的闡釋，是雙極性（同一性／相異性）的闡釋」。³⁰從巴柔到莫哈的論述，皆將文本的異國形象置於更龐大的社會集體的網絡觀察，凸顯形象的生產與製作過程，反映從「個體—群體—整體」中的「自我」與「他者」形象的形塑。

（二）翻譯改寫

在文本跨文化行旅的過程裡，翻譯乃是形象呈現的途徑和媒介。在當代的文化研究論述中，翻譯學研究早已脫離語言層面上的指導原則，反而是在文化研究

29 [法]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著，孟華譯，〈形象〉，收入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56-157。

30 [法] 讓·馬克·莫哈著，孟華譯，〈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與方法論〉，收入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24。

的脈絡下，關注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的轉換以及箇中所蘊藏的文化訊息，探討跨語際傳遞中既成的文學現象或文化現象。翻譯學如同形象學，關注目標語的社會民族文化自我身分和自我形象構建的功能。

翻譯有助於創造集體身分，構建民族文化，反映他者形象形塑，重塑特定歷史文化語境下的形象生產與傳播，如勒弗菲爾（Andren Lefevere, 1945-1996）考察各時期的聖經譯本如何改變歐洲大陸的自我形象，如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德譯本，不僅對德國語言和文學產生影響，甚至改變基督教和西方文明。³¹ 因此，翻譯研究有助於反映不同社會文化語境的譯者如何透過翻譯實踐的模式，塑造、改變、傳播和強化異域民族及其各種族群的文化形象與文化隱喻。對於「他者」與「自我」關係的探索，實也是探向譯者主體自身身分構建的另一視角。

若就翻譯理論而言，操縱派強調「翻譯」受到各因素的開拓／制約，是對原文的一種改寫（rewriting）」，如西奧·赫曼斯（Theo Hermans, 1948-）指出為某種目的「對原文實施一定程度的操控（manipulate）」，³² 譯者的歷史、社會與文化語境，必然牽動譯本的面貌，形塑一更能適合該文化語境的主導意識形態和詩學。勒菲弗爾提及翻譯受到意識形態（ideology）、詩學形態（poetology）、贊助機構（patron）與論域（universe of discourse）等影響，³³ 對於原著進行調整，使其更符合改寫者所處時期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和詩學形態，進而達到被接受的目的。相關論者提及翻譯學研究涉及意識形態、贊助機構、文化策略、國際環境、國家之間的關係等包含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因素。其中，尤為本書關注的是譯者詩學的注入，如何對於譯本產生變化？譯者如何在其所處的文化體系

31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1992), 126-127.

32 Theo Hermans,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985), 11.

33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9.

中使其譯文符合其所處時期的詩學形態，以達到原著被接受的目的？³⁴

譯者對原著的理解及其翻譯是一次「再創造」，而閱讀譯著的他國讀者的閱讀過程，同樣是一次「再創造」。法國文學社會學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2000）將翻譯轉調視為「創造性的叛逆」（creative treason）：「說翻譯是創造性的，那是因為它賦予作品一個嶄新的面貌，使之能與更廣泛的讀者進行一次嶄新的文學交流；還因為它不僅延長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賦予它第二次生命。可以說，全部古代及中世紀的文學在今天還有生命力，實際上都經過創造性的背叛。」³⁵ 從「翻譯操縱」、「翻譯創造」論等，都反映翻譯學的研究重點從「原文為中心」轉到以「譯本為中心」。

「譯介學」更進一步推進如此的研究模式，從跨文化、跨語言、跨民族的角度來考察、研究翻譯，關注跨文化交流的實踐。謝天振《譯介學》指出「譯介學」並非語言研究，而是文學研究或文化研究，「它關心的不是語言層面上出發語與目的語之間如何轉換的問題，它關心的是原文在這種外語和本族語轉換過程中信息的失落、變形、增添、擴伸等問題，它關心的是翻譯（主要是文學翻譯）作為人類一種跨文化交流的實踐活動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和意義。」³⁶ 從「譯本的作用」，側重文化層面對翻譯進行整體性的思考，擴大譯介學的理論視野和研究範圍。

上述各種關於形象與翻譯理論的思考，未必壁壘分明，卻相互呼應，投射殊途同歸的關懷視野，共同指出譯本在跨文化行旅中的翻譯創造／想像。在主、客方語言與內容的協商與調整過程中，譯本又如何受到意識形態、文化規範、民族心理與美學成規的形塑，使得來源語進入目的語的過程，為適應特定的文化語境而出現翻譯改寫的情形。

34 Andre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26.

35 [法] 羅·埃斯卡皮著，王美華、于沛譯，《文學社會學》（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7），頁 137-138。

36 謝天振，《譯介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頁 1。

(三) 晚清的翻譯實踐

本書固然以理論作為思考的起點，可是並非理論導向，更重視晚清譯者的文化脈絡、文獻材料與文本細讀，具體而微地觀察非洲文本翻譯傳播到晚清中國的途徑、接受方式以及譯本的轉向。

從十九世紀七、八〇年代立溫斯敦與施登萊探勘非洲的人物傳記，發展至二十世紀初凡爾納與哈葛德的冒險小說譯本，有逐漸成熟化的趨勢。早期譯者較難同時掌控外語與中文文采，因而常出現口譯與筆述者合作的翻譯模式，擴大譯著與原著的差距，遂使得《黑蠻風土記》與《三洲遊記》都出現路線錯亂與迷失方向的問題，甚至改變原著的主旨。隨著翻譯風潮與翻譯理論的崛起，翻譯模式趨向嚴謹，二十世紀初的翻譯模式擺脫改頭換面的譯法，即或屢為人「詬病」的林紓譯著，已然大幅度躍進，趨向嚴謹。雖然，林紓仍然無法擺脫口譯者與筆述者的合作模式，可是其一系列非洲譯著，大致可以呈現原著的架構與面貌。謝斂更是克服口述者與筆述者的距離，獨自翻譯《飛行記》，緊貼其所依據的日譯本，一一呈現原著專業性較高的內容，已然告別早期方向迷失的問題，對於晚清小說界而言，無疑是「地理小說」範本。

針對晚清人士的翻譯實踐，學界陸續出現各種研究。早於明清的宗教文本翻譯，便有翻譯改寫的現象，如李爽學（1956-）研究明末耶穌會的印刷文本，歸納各種譯作行為的「動詞」，如「授」、「述」、「口授」、「口譯」、「口說」、「譯述」、「演」、「譯義」、「達辭」及「撰述」等，³⁷ 都凸顯翻譯改寫的現象。發展到晚清譯本，名目更多，如陳大康（1948-）提及晚清各種譯著標為「譯述」、「編譯」、「譯演」、「譯意」、「譯編」、「意譯」、「譯著」、「輯譯」與「演譯」等。³⁸ 這些翻譯改寫的名目諸多，卻殊途同歸，透過改寫模式，重塑一更能符合自身語境

37 李爽學，〈翻譯的旅行與行旅的翻譯：明末耶穌會與歐洲宗教文學的傳播〉，《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第33期（2010年7月），頁53。

38 陳大康，〈翻譯小說在近代中國的普及〉，《文藝理論研究》2012年第3期，頁53-57。

的譯本內容。王宏志指出譯者不容易為傳統讀者所接受的部分刪改，盡量配合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口味，「這時期的翻譯風尚，仍是一種所謂『豪傑譯作』式的意譯或甚至『譯述』」。³⁹陳平原（1954-）提及域外小說乃是以「意譯為主的時代風尚」，指出梁啟超等人所述的英人語「譯意不譯詞」，頗為時人信奉。⁴⁰

針對晚清的「譯述」模式，關詩珮指出「意譯」一詞無法全面概括晚清的翻譯規範，因為它把一切重譯、重述、撰述、譯述、節述、偽譯、豪傑譯都包括在內，有些「譯作」往往經過兩三次重譯或重述而成。⁴¹陳宏淑指出西方著作進入日本脈絡時，先經歷日本明治時期盛行的「翻案」譯法。所謂「翻案小說」，乃是翻譯加上改寫，與許多中國學者所稱的「豪傑譯」異曲同工，⁴²經由各種刪減、增添與改寫的過程後，進入中國，又再次經歷大幅改寫、增刪情節等。

上述「譯述」、「編譯」、「譯演」、「譯意」與「譯編」等，慣常以「意譯」為代表的概念，確實反映晚清「不忠實」的翻譯模式。可是，此一不忠實的翻譯手法，從當今的翻譯研究而言，卻又潛藏著各種跟意識形態、文學美學與社會準則等相關的大有可為的研究視野。李歐梵（1942-）透過跨文化研究視角，提出一具有啟發性的研究構想——「接枝學」：研究一棵外國的樹如何在移植到中土後產生變化，其枝葉之間的分歧和接合（也就是莫萊梯〔Franco Moretti, 1950-〕所謂的「diversity」和「convergence」）。他援引莫萊梯理論，指出支柱雖然是類型，但方法絕對是從技巧的細節，也就是「device」作起，二者之間的互動和弔詭才是他的方法的原動力。⁴³晚清的翻譯固然逸出原著甚多，可是卻可能透過枝

39 王宏志，〈「暴力的行為」——晚清翻譯外國小說的行為及模式〉，《重釋「信達雅」：二十世紀中國翻譯研究》（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9），頁154。

40 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第一卷（1897年—1916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頁46。

41 關詩珮，〈現代性與記憶——五四對林紓文學翻譯的追憶與遺忘〉，收入陳平原編，《現代中國》第1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93。

42 陳宏淑，〈譯者的操縱：從Cuore到《馨兒就學記》〉，《編譯論叢》第3卷第1期（2010年3月），頁62。

43 李歐梵，〈見林又見樹：晚清小說翻譯研究方法的初步探討〉，《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2期（2016年6月），頁10。

節的改變，推動文學類型的進展。如王德威（1954-）曾指出晚清翻譯或許一無所獲，但亦能學得嶄新的東西，從而改變思維方法和敘事形式：「譯文拮据的文筆、怪誕的修辭、陌生的用語、不連貫的辯證，也許只是譯者能力限制的表徵，也許更指證與外來及本地語言、知識、符號系統間的差異及斷裂。」⁴⁴

若就十九世紀七、八〇年代的探勘非洲的文學譯本而言，因正處於文學翻譯的起始階段，比起上述各種晚清譯本的改寫幅度，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譯著對於原著進行大規模的變動，甚至連根拔起，抽離原著主幹，面目全非，恐怕非一般「意譯」模式所能詮釋。本書拓展可能的詮釋模式，如提出「抽離主幹」與「拼湊片段」等。「主幹」乃是原著最核心的要素與形式，涉及作者所欲投射的主旨、價值、準則與訴求，一旦遭受根本性的抽離，必然會產生徹底性的變化。譯者抽離原著的主幹，使之變為更能符合自身視域的文本。

相對於「抽離主幹」對於原著主旨中心的根本變動，「拼湊片段」則是從周圍加入譯者關懷的片段，如翻譯的過程中，嵌入滬地文人的情誼、科學原理與詩詞文采等。譯者調動／剪接／並置各種其關注的片段，從渲染情感的詩詞片段到傳播新知的新聞內容，恰能反映八〇年代譯者共存的多層旨趣。

五、本書架構與論文出處

本書在文本「跨文化行旅」的研究架構下，觀察非洲探勘／探險文本在翻譯與傳播過程中經歷語言文字、概念表述與情節片段流變，進而探索其背後隱藏的意義與訴求。相關著作譯為中文後，亦可能因不同因素而獲得重版或再版的機會，衍生不同版本，隱藏著不同的文化訊息。本書經過漫長的時間，蒐集各種文獻資料，勾勒完整的跨文化行旅路線，且檢視各譯本的不同版本，探索與評估其特點與訴求，試圖建立起近現代文化界對於非洲文本的接受視野，盼能推進研究

44 王德威，〈翻譯「現代性」——論晚清小說的翻譯〉，《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105-106。

進程。

在章節結構的安排上，本書第一至第五章探索各非洲探勘／冒險記，翻譯傳播到晚清文化界的歷程，以及探索文人譯者的譯介想像模式。第六章則是在前五章的基礎上，結合晚清報人、文人與譯者等綜合性的視角，觀察中國人對於「非洲」形象的塑造，恰好形成一從接受、轉換到創作的歷程。

本書各章的基礎為六篇論文，其中四篇完稿較早，通過期刊與專書的審查程序，刊登於學術期刊與學術專書。另兩篇論文完稿較晚，其中一篇曾發表於學術會議，一篇為本書首次發表。為配合專書的完整性，各章已進行程度不一的調整與改寫。以下為各篇論文出處：

(一)〈晚清文化界對於 David Livingstone 與非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收入李爽學、胡曉真編，《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15，頁 435-486。

(二)〈地理學論域、譯者情感與宗教理念的轉向：晚清《三洲遊記》對於施登萊《穿越黑暗大陸》之翻譯改寫〉，《漢學研究》第 37 卷第 3 期，2019 年 9 月，頁 131-169。

(三)〈拆除主幹，拼湊片段：論《斐洲遊記》對於施登萊 *Through the Darkness Continent* 的重構〉，《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53 期，2018 年 9 月，頁 1-46。

(四)〈演述非洲，言說中國：晚清作者筆下的異域形象與自我投射〉，《東亞觀念史研究集刊》第 19 期，2021 年 9 月，頁 301-360。

(五)〈地理路線、文明階梯與科學冒險：論凡爾納《氣球上的五星期》在晚清的接受與傳播〉，「文體和時空：2021 近現代文學與文化線上工作坊」，2021 年 8 月 29 日，馬來亞大學中文系。